

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组织论述评

——以比岱和迪梅尼尔为中心

王一成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组织是一个历史性范畴, 尽管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组织形式, 但不同的历史性生产方式赋予不同的组织形式以特定内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历史由来与本质规律, 奠定了组织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以比岱和迪梅尼尔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元结构”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提出要把组织问题提升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协调逻辑, 主张从市场与组织的相互蕴含中把握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 以此重新找到革命主体。但因为立场的偏颇与方法的局限, 他们无法对这些新现象做出准确的解读。梳理马克思的组织理论及其哲学意义, 进而阐明“元结构”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区别, 不仅有助于揭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本质内涵, 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解。

关键词: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 组织; 阶级关系; 《资本论》; 管理革命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3-0022-09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组织问题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不仅构成全部“现实的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 同时也是区分不同历史性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 组织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类生产实践活动, 不同的社会形式也赋予组织本身以不同的表现形态。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组织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从思想史上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与大工业”的分析正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体系的科学剖析;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组织的深刻探讨;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合理化进程的关注针对的则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新型生产模式。为此,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和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把整个 20 世纪称为“组织的世纪”。他们甚至提出:“马克思曾设想的、因缺乏社会化协调而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由于组织关系的引入成功地拯救了自己, 与之相反, 基于计划协调生产的苏联社会主义却因为组织机构的日益官僚化反而葬送了自身。”^{[1](83)}在比岱和迪梅尼尔看来, 与市场一样, 组织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协调逻辑, 他们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元结构”基础。应当说, 当代欧洲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新变化出发重构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学术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但因为立场的偏颇与方法的局限, 他们无法对这些新现象做出准确的解读。梳理其“元结构”组织论, 阐明其与马克思组织理论的区别, 不仅有助于揭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本质内涵, 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解。

收稿日期: 2022-11-21; 修回日期: 2023-02-28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法国学界对《资本论》的解读及其评价研究”(22ZXC00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7 批面上资助(2020M671590)

作者简介: 王一成, 男, 江苏常熟人, 哲学博士,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邮箱: hegelandmarx@163.com

一、基本概念：组织应跻升现代社会关系分析的“元结构”

虽然比岱和迪梅尼尔从不同的理论视域(政治哲学与宏观经济学)出发指责经典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组织的独特作用,但是他们却一致认可马克思是组织理论的大师。实际上,在以《总体理论》为代表的上一个思想阶段中,当比岱提出要从市场与组织的双极性出发修正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基础时,这一观点就已经有所展现。他指出,当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就已经将资本与组织这两个因素衔接在一起,只不过他是把组织的职能一并归结为“资本的支配权”^{[2](210)}。到了《替代马克思主义:为了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替代马克思主义》)中,比岱和迪梅尼尔进而指认说:“马克思既是最早提出把市场与组织当作两种不同的经济协调形式的思想家,又在《资本论》中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剖析现代社会的动态运转提供了科学视角。”^{[1](83)}具体而言,他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组织理论的思想贡献。

第一,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而将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分析推进到对更为现代化的整个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分析。分工理论是斯密经济学的两大支柱之一,他的基本观点是:分工的最大效用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实施劳动分工的手工工场内部,雇佣工人之间的协调关系由组织承担,而非市场^{[3](5)}。如此一来,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组织)与手工工场之间的自由竞争机制(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经济协调机制。马克思对斯密分工理论的继承与突破主要体现为两点:(1)把“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逻辑加以分析,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有别于《资本论》起始部分关于“商品关系”的论述。(2)从更宏观的角度考察了现代公司内部的分工与组织形式,即从生产场所到整个公司组织运转的基本法则。比

岱和迪梅尼尔认为,马克思对组织形式的探讨贯穿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中,虽然他将组织形式或管理职能看作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附属品或派生物,因而把组织或管理职能定义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是却坚持认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生产性功能,并且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86)}。

第二,马克思除了分析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外,还探讨了金融领域中的组织形式。比岱和迪梅尼尔说,在分析金融领域中资本集中的趋势时,马克思把金融指认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管理形式”,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现代金融机构的使命,即管理融资资本。以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机构将融资金借贷给各个公司,这一‘信贷’行为的目的是使得资本在不同领域中更为有效地实现价值增殖”^{[1](87)}。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金融领域中组织形式的分析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企业的范围,他是站在整个社会层面的角度探讨另一种区别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协调形式。由此出发,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同样看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层面趋向于一种社会组织化的进程^{[4](494)}。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还未能料想到20世纪“宏观经济政策”的出现,将会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三,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由“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组织社会主义”,即将组织取代市场看成是人类社会生产形式发展的历史性结果。比岱和迪梅尼尔指出,马克思除了分析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着重强调了组织形式的重要作用,在《资本论》的另一处即“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部分,更是强调组织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87)}。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判断是,资本的集中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进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因而要求突破原有的生产方式,由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共同协作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换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数量却不断减少,“公司内部的组织理性也会逐渐侵入市场理性的领域,进而取代市场形成另一种新的社

会协调模式”^{[1](88)}。这种以组织为基础的新秩序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即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民主协调与计划生产模式。

在揭示了马克思组织理论的三重哲学意义后，比岱和迪梅尼尔笔锋一转：“尽管组织问题在马克思历史共产主义的思想脉络中如此重要，但《资本论》对它的处理却相当草率——不仅没有作为单独的篇章计划或专题章节，即使是在‘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论述中，马克思对组织问题的探讨也是潜藏在对剩余价值研究的一般论证之中。”^{[1](88)}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尽管《资本论》对组织问题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但马克思没有把它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组织理论进行了批判。

首先，《资本论》从“商品”概念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从一开始就考虑组织这一维度。比岱和迪梅尼尔强调：“马克思只是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的分析中真正地整合了‘组织’这个事实，而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解释。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将组织因素排除在其抽象开端之外，是因为他将组织视为资本主义的一项趋势成就，主要是将组织的发展置于较高级的阶段。”^{[1](89)}在比岱和迪梅尼尔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策略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组织关系形成演化的前提条件，但实际上，这“并不能排除组织以胚胎的形式存在于简单商品形式中”^{[1](89)}。根据“元结构”理论，市场的出现必须有组织形式的保障，两极分别对应且相互蕴含，不能脱离组织维度去设想一种纯粹自律性的市场。其次，在对资本主义管理职能的分析中，即在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职能以及对应的社会阶级。“企业内部承担组织职能的管理人员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与无产阶级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1](89)}但是，马克思对此没有给予太多的理论关注，反而在历史目的论的推演方式中把自己提出的问题一并取消了。最后，20世纪的历史和理论皆证明，“同市场关系一样，组织关系也是阶

级关系产生的土壤，是新型社会阶级关系的载体”^{[1](90)}。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组织职能的干部或管理人员与处于组织关系底层的群众之间有着巨大的阶级差别，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比岱和迪梅尼尔指出，马克思曾以为组织取代市场就可以消灭剥削和压迫、取消阶级关系，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但他始终没能料想到组织也可以催生出阶级统治。

我们认为，尽管比岱和迪梅尼尔认可马克思组织理论的思想贡献，并且声称自己是基于理论与历史的双重反思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但他们明显误读了马克思，因两者显然是在不同的层面加以言说的，即一是从历史哲学的层面，一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层面。换句话说，马克思历史性的组织理论到了比岱和迪梅尼尔那里转变成了静态结构中的经验阐释，他们无法洞悉马克思组织理论的深层哲学内涵，而只能以外在拼接的方式把唯物主义历史发生学转化成形式逻辑结构分析法^{[5](193)}。

其一，从起源来看，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或管理职能最初产生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是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赋予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和指挥权。马克思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6](384)}尽管在资本主义之前，组织或管理业已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了组织形式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相交换，继而成为可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就是资本的生产过程。雇佣劳动之所以要听从资本的指挥，是因为它已经将自身让渡给资本——不是为自己劳动，而仅仅是被资本消费。“协作”赋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新的内容：“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6](378)}值得注意的是，协作赋予资本的支配权本质上不是由资本自身的职能产生的，而仅仅是因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资

本掌握了对生产过程的指挥权。由此观之，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雇佣劳动制度，对组织关系与管理职能的探讨不能离开本质性的劳资关系。

其二，从性质来看，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具有二重性，它既承担着一般组织形式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特殊剥削性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同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活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6](384)}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不同于一般社会化生产组织形式的地方在于，前者本质上是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来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组织管理模式，蕴含着不可避免的本质矛盾性与阶级对抗性。进一步而言，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或管理职能的二重性不会因为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消失，即使资本家把组织权力或管理职能让渡给专门的经营管理人员，只要这种组织形式或管理活动仍然从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那么它必然也具有二重性。

其三，从结果来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组织形式或管理活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并且“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6](385)}。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一旦同资本完成交换进入生产过程，它便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可变部分发挥作用。“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6](387)}尽管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资本本身的职能，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劳动的组织形式是经由雇佣劳动制度的特殊中介为资本所支配的，因而它内在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在社会分工层面上显示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者

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的，但它却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实行严格的专制制度，因为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

总的来看，比岱和迪梅尼尔混淆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在分工理论上犯了同亚当·斯密一样的错误。他们难以识别不同历史形式下组织形式的根本差别，只是因为看到了组织因素在现代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加以理论化。实际上，他们所强调的“组织”概念在内涵上相当含混：既没有清晰地区分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与社会政治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二重属性。与之相反，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逻辑的运动规律，科学地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构成了资本发展的界限。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虽然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进一步而言，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中，尽管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脱胎于旧有的生产方式，但它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和组织形式，而是一种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组织化协调生产的新型历史形式。一句话，马克思组织理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组织问题放回社会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而不是像比岱和迪梅尼尔那样泛泛而谈。应当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的历史现实出发重视组织因素在现代社会阶级建构中的作用，这是可取的；但他们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失误归因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现代社会组织关系体系的设定： 资本主义与“干部主义”

从根本上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于，它把组织逻辑提高到与资本逻辑同等的理论地位，并将二者视为现代性的根本要求。在新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组织关系，此种组织关系与资本关系一样也是阶级关系的载体。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在其可能性上拥有两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体系：“一种是资本主义，其主导阶级是资本家和无产

者,它的本质特征与运行规律已被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认;另一种是干部主义,其主导阶级是在组织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干部阶级与处于底层的人民群众,其现实载体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1](91)}比岱和迪梅尼尔指认说,他们对于当代社会阶级关系的探讨始终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从生产关系出发探讨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结构形式。组织关系之所以能够催生出阶级关系,正是因为它在现代经济中成为一种基本的生产协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比岱和迪梅尼尔在这里把基于组织逻辑的、在组织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的统治阶级称为“干部”,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干部’一词比‘组织者’或‘管理者’一词更适合于用来指称这种特定的阶级关系形式,是因为前者更能反映它赖以构建的原则秩序:一定的等级体系”^{[1](91)}。毫无疑问,这里的“干部”是指那些在特定的组织结构或等级体系中被赋予特定权力的人,其统治地位的获得凭借着组织关系中特定权力的赋予。

在《总体理论》一书中,比岱从“元/结构”视域出发把握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区分“资本二重性”与“雇佣劳动二重性”的思想,继而将与所有权资本相联系的阶级指认为资本家阶级,将与资质资本相联系的阶级指认为组织权能者阶级。组织权能者或资质资本持有者,涉及一切事先协调的、从“市场—企业”到“组织—国家”各个领域内的职位,包括所有类别的经营者、管理者、公务员和国家干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组织层级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前提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253)}。实际上,在比岱这里,无论是组织权能者,还是干部,两者本质上属于一类范畴,它们都被用以指称在现代社会区别于资本家阶级的另一种统治阶级。所有权资本与资质资本,或资本家与干部,虽然他们共同构成现代社会阶级统治的两极,但是两者在权力来源、社会实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等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1](95)}。

比岱和迪梅尼尔认为,尽管市场与组织作为两种基本的经济协调形式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统治逻辑,但这仅仅是在形式构建的可能性上加以探讨。20世纪现实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市场与

组织总是交织在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的具体运作模式,并且组织因素在经历了数次生产革命后愈发显示出自己的重要作用。因此,现代社会不能被叫作“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而应被视为“资本干部主义”^①社会。在他看来,他所谓的“资本干部主义”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约翰·加尔布雷特等所探讨的“管理资本主义”,以及欧洲学者惯常谈论的“混合经济”有相似之处,三者都强调从市场与组织两种不同的协调形式出发分析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资本干部主义”区别于后两者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它将组织因素视为可以脱离资本关系的独立逻辑,譬如说单纯基于组织维度的“纯粹干部主义”(cadrisme pur)就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变体;另一方面它始终致力于从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当代社会的基本运转,即在市场与组织的相互蕴含中把握现代社会的多元阶级关系。

在比岱和迪梅尼尔看来:“对于熟悉马克思工作的人而言,同一社会形态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并存,这种提法不是混乱的,因而‘资本干部主义’是可以成立的。最明显的先例是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1](93)}显然,他们在这里以举例论证的方式意在说明: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间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关系复杂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复合型的“杂交式社会形态”^{[1](93)}。同理,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其间也有一种复合型的社会形态,即组织关系出现在资本关系之中。在他们看来,尽管组织关系一开始来源于资本权力的部分让渡,但是一旦当组织关系成为稳定的经济协调形式之后,它就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关系而构成一种拥有自己独特统治逻辑的社会关系。我们看到,如果说在前两个思想阶段,比岱还是把组织作为与市场既对立又蕴含的经济协调形式来看待的话,那么到了这里,他已经把组织因素上升为一种可以主导某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基本生产形式。在比岱和迪梅尼尔看来,这种以组织因

素为主导的计划协调生产模式不是马克思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恰恰相反，它能够催生出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型社会阶级结构。

那么，这种复合型的“资本干部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在当下又有何种表现呢？比岱和迪梅尼尔指出，从历史上看，组织逻辑的凸显以及以组织因素为基础的干部阶级的出现晚于资本逻辑的充分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组织关系或管理关系一开始从属于资本关系^{[1](94)}。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经由劳资交换的特殊中介，资本获得了对劳动力商品的指挥权和支配权，原先并不属于资本职能的组织职能与管理职能也一并归入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家把部分管理职能交付给特定的经营管理人员，他们也具有对后者的支配权与统治权，这是因为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的根本目的没有发生变化——始终是资本增殖。然而，随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生产要求的进一步提高，资本不得不进一步让渡管理权给特定的组织人员。“这些组织权能者尽管同雇佣工人一样也是资本购买所得，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直接的薪资报酬方面，还是在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别。”^{[1](96)}其带来的后果便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组织权能者或干部群体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阶层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家也逐渐意识到，新型组织管理阶层的出现势必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威胁与影响，因而也会通过控制金融资本、节制管理活动等手段进行调整。

比岱和迪梅尼尔进而指认说，真正使得组织权能者从一个阶层上升为一个阶级的是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四次重大调整：垄断公司形成、金融体系发展、管理革命与宏观经济革命^{[1](59-60)}。组织关系的引入不仅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几次经济危机，而且政府干预经济的整体运行使得资本主义脱离了原有的自由阶段，转向一种依托于组织权力的“资本干部主义”。组织权能者或干部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是只有资本增殖一个目的，而是还有组织权力

的相对平衡与再生产。干部阶级一方面能够对资本权力进行有效的遏制，资本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差距愈发缩小；另一方面他们与基础阶级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逐渐成为具有自身组织优势的干部阶级。上述情况在二战后的欧美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所有权资本与资质资本的双极统治构成了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标志。进一步而言，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后，即当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需要把组织管理权收归自身之后，“资本干部主义”的发展趋势依旧没有终止。“当代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国家一方面声称要减少任何不必要的组织形式和外部干预，另一方面却在组织形式与宏观干预的联合作用下把自己的触手伸向了全球。”^{[1](98-99)}比岱和迪梅尼尔总结说，仅仅从所有权资本出发已经无法准确理解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我们所处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资本与干部的双重统治。我们无法去构想此种“资本干部主义”究竟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参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在阶级结构的动态演变中寻找基础阶级的斗争策略。

三、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建：从“两极统治”到“三方游戏”

自政治式地解读《资本论》开始，比岱就一直强调《资本论》科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既不在于人本主义异化批判，也不在于提出了“两个必然”的革命宣言，而是它的分析框架与科学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1](173)}。继而在《总体理论》中，比岱仿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形式构建出“元/结构”理论，即从“元结构向结构转化”的角度阐述现代社会的动态运行机制，试图在市场与组织双重中介的相互蕴含中把握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统治形式。总体而言，《替代马克思主义》一书基本继承了上述思路，他们在《替代马克思主义》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从“元结构”视域出发进一步阐明“资本干部主义”的历史本质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础阶级当下的革命战略选择，而不仅仅是在历

史学层面阐述 20 世纪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过程中的某些局部经验现象。

比岱和迪梅尼尔指出,虽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为劳资矛盾,但是《资本论》没有以直接性的劳资对抗关系作为自己的论述起点,它选择的切入点反而是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经济协调形式,即“市场”形式。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就是在此处,即《资本论》的“商品和货币”章,继承了“自由主义的理论遗产”^{[1](116)},把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本质原则确定为“自由平等理性”的人际关系原则。但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没有从某种外在的理想性关系出发构想现代社会运行的一般原则,也没有直接面向经验具体,而是在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中、更确切地说是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比岱和迪梅尼尔的解读思路是这样的:马克思把自由平等理性的社会秩序视为一种“抽象”,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对抗关系是一种“具体”;作为“具体”的资本逻辑只能以作为“抽象”的市场逻辑的客观存在为自己的前提,但与此同时,是“具体”提出了“抽象”要求。换句话说,“是现实阶级社会的剥削、统治和压迫提出了作为自由平等理性之现代性宣言的要求”^{[1](116-117)}。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论述方法揭示出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双重联结关系,并进而表明现代社会的深层统治是以自由平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

由此出发,比岱和迪梅尼尔将马克思指认为“元/结构”理论的先驱。他们进而指出,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却是不完整的。他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错误诊断源于他对资本主义抽象基础的认识不足。实际上,“作为现代性宣称前提的‘元/结构’具有双重面相,它不仅提出了经济理性的要求,还赋有政治合理性的要求。从合理性视角下的政治契约形式来看,它包含两个极,个体间契约与中央契约;与之相应,从理性视角下的经济协调形式来看,它也包含两个极,市场与组织。”^{[1](118)}进一步而言,个体间契约与中央契约,或市场与组织,两者互为前提且相互蕴含,它们

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一般性原则。而“元/结构”的过程,或者说“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就是自由平等理性的社会秩序倒置为剥削统治压迫的阶级关系的过程。在“元/结构”视域中,“辩证转化”不能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加以把握,它包含着三重含义:(1)只有双重的才是辩证的;(2)辩证转化的过程就是“元结构”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程;(3)转化的动力是阶级建构与阶级斗争。

比岱和迪梅尼尔强调,只有通过弥补马克思“科学抽象”部分的不足,我们才能在市场与组织的双重中介中构想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这是因为,“元/结构”理论表明,现代社会不是资本一极的单独统治,而是还包含组织一极。他们指认说:“通过这样做,人们对现代社会关系有更真实的理解。‘元/结构’理论融合了近代以来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贡献(特别是韦伯和布尔迪厄),它表明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不仅是指生产资料所有者,还有同样多的经理、组织者或主管。”^{[1](121)}比岱和迪梅尼尔的意思是,资本家或组织权能者分别占据着现代社会统治阶级的两端,它们虽然在阶级基础、实践方式与权力更替等方面各有不同,甚至还会一度处于对立冲突状态,但两者本质上的相互蕴含关系使得它们共同构成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两极。在这种情况下,“与统治阶级相对应的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基础阶级,它们分散在市场与组织的等级网格之中”^{[1](122)}。与马克思仅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角度理解“资本”之内涵意义不同,在比岱和迪梅尼尔看来,现代社会由于组织权力的介入,“资本”范畴应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握。在劳资交换环节,雇佣劳动不仅可以把自己作为劳动力商品让渡给资本家,还可以出卖给特定的组织,后者不仅包含私人公司,还有各个层级的政府管理机构、社会服务部门,甚至是劳动协会或工人组织。资本指挥下雇佣劳动的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可以为所有权资本所占有,还可以为资质资本所支配。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雇佣劳动始终属于市场与组织的统治网格之中,或是通过市场形式与所有权资本相联系,或是通过组织形式与资质资本相联系,又或是处于两种形式的交融状态中。

如此一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能被简单地表述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资本家、组织权能者与基础阶级三者之间的矛盾。比岱和迪梅尼尔进而认为，“元结构”理论超越历史辩证法的地方在于，它是在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分析中、而非从历史目的论角度揭示现代社会的动态发展趋势。如果以“元/结构”方法来洞悉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话，那么它就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主奴辩证法”，而是资本家、组织权能者与基础阶级之间的“三方游戏”^{[1](191)}。“元/结构”过程，或从元结构到结构的转化，历来就不是单向度的历史发生过程，因而不能被理解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权力发展过程，而是统治阶级与基础阶级之间围绕阶级斗争不断生成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作为现代社会公开性宣言的“元结构”具有对现实社会阶级结构的“质询”功能，它能够使市场与组织双重中介以联合的方式不断审视自身，从而为基础阶级自身的解放提供客观条件。

在比岱和迪梅尼尔看来，“元/结构”理论为揭示现代社会的所有可能性形式打开了空间，因为“元结构”蕴含的三项组合涵盖了现代社会所有的演化状况。其中，直接性的言语合作关系既会导向不同的契约中介，同时又是对现实阶级社会的理想化超越。这意味着，基础阶级可以通过直接的言语沟通进行“自由联合”——自己决定生产与分配、交换与共享。但问题是，“以结合性为特征的工人协会或联合团体一旦形成，它便会转向组织形式，并逐渐建立起组织中介所特有的等级结构，进而陷入现代社会双重中介的统治形式中”^{[1](126-127)}。正如20世纪集体主义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组织本身就像市场一样，它也是一种阶级因素，会催生出阶级关系”^{[1](129)}。比岱和迪梅尼尔指出，直接的言语合作之于市场和组织而言，“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监管理念，一种指导原则”^{[1](127)}，是一种最终意义上审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根本法则。换言之，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基础阶级解放斗争的最终目标不是消除作为社会基本协调原则的市场形式或组织形式，而是消灭双重中介的阶级因素，是以直接的合作形式改造市场与组织，使之成为无阶

级、无特权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

比岱和迪梅尼尔对当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有可取之处，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管理革命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组织管理者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经验化的解读思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较大的偏差，两方不是站在同一层面进行对话的。在马克思那里，阶级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而且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是深入历史本质性的生产关系层面去探讨特定阶级的历史由来、现实表现与未来发展的。而比岱和迪梅尼尔则更偏向于社会学层面的经验化分析，他们所谓的组织权能者或干部群体在概念上过于宽泛，缺乏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

四、结语

诚如上文所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业已揭示出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组织管理之于资本的运动过程而言，既承担着某些一般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又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的价值增殖目的^{[6](385)}。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便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管理活动仍然具有二重属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组织权能者必须按照其职能特征的不同具体加以探讨。从根本上说，无论组织管理职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要它们附属于资本，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另外，就组织因素本身是否具有阶级效应而言，比岱和迪梅尼尔的论证也过于独断。他们所谓的“组织”与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视域中的“组织”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脱离社会历史过程的抽象因素，因而具有多种多样的构建方式和演化形态；后者则是指特定的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计划协调生产模式，其前提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占有。从根本上说，组织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尽管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组织形式，但不同的历史性生产方式赋予不同的组织形式以特

定内容。实际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其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确实使得一个官僚特权集团得以诞生,但这恰恰是背离了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直接后果。

注释:

① “资本干部主义”(capito-cadristism)是比岱和迪梅尼尔创造的词汇,他们用此来指称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组织形式相混合的资本主义形态。与之相对,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纯粹干部主义”或“单一干部主义”(cadristisme pur)。之所以要用“干部”这个词汇,是因为比岱和迪梅尼尔着重从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况。在他们看来,“资本干部主义”是一种事先协调的组织系统与事后平衡的市场机制彼此结合的资本主义样态,它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四次革命”(公司制度、金融部门、管理革命、政府干预)。自此之后,国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资本干部主义”社会,管理人员不论是

处于私有企业部门还是国家机构中,它们作为“干部”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体,都属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资本干部主义”相当于美国管理学家所谓的“管理资本主义”或者欧洲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的“混合经济”。

参考文献:

- [1] BIDET J, DUMENIL G. Altermarxisme: Un autre marxisme pour un autre mond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UF), 2015.
- [2] 雅克·比岱. 总体理论[M]. 陈原,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郭大力,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5] 王一成. 比岱与杜梅尼尔“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评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5): 186-19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Neo-Marxism and its evaluation: Take Jacques Bidet and Dumenil as examples

WANG Yich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 is a historical category. Although all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human always rely on specific organization forms, different historical production modes give different organization forms specific contents. In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Marx scientifically disclosed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essential law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organiz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ta-structure and the new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rench Neo-Marxism, represented by Jacques Bidet and Dumenil, proposed to upgrade the organizational problem into a basic social coordination logic, and advocated to grasp the class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cture of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mutual implication of market and organization, so as to rediscover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But because of the bias of the posi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method, they are unable to make an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new phenomena. Sorting out Marx's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n clarifying the methodological parallax between "meta-structure" the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t only help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but als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ism.

Key Words: French Neo-Marxism; organization; class relations; *Das Kapital*; management revolution

[编辑: 胡兴华]